

襄汾县志评论集

临汾行署方志办编

山西人民出版社

襄汾县志评论集

编辑 张志俊 成国杰
杨克让 贾生金

山西人民出版社

襄汾县志评论集

临汾行署方志办编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

襄汾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5.34 字数116千字

1991年10月第1版 1991年10月襄汾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册

ISBN 7—203—02091—6

K·93 定价：2.80元

目 录

序

-山西省地方志协会 曹振武 (1)
- 《襄汾县志》一书很值得一读
-中国科学院 贾兰坡 (3)
- 评《襄汾县志》
-黑龙江省志编委会 梁滨久 (5)
- 《襄汾县志》的写作艺术
-吉林省地方志编委会 苑广才 (13)
- 志苑新葩 白璧微瑕
- 评《襄汾县志》
-江苏省地方志办 李 明 谢兴祥 (26)
- 山西金银宝县的真实科学写照
- 评《襄汾县志》的特色表述
-陕西省地方志编委会 解师曾 (35)
- 传世佳著 志苑楷模
- 《襄汾县志》读后感
-中国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 郝建贵 (45)
- 论《襄汾县志》抽象和具象
-云南省地方志编委会 宋永平 (61)

- 读《襄汾县志》的思考
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 杨大辛 (67)
- 丰腴的沃土 深厚的文化
 ——《襄汾县志》读后感
江西省志编辑室 刘柏修 (71)
- 谈《襄汾县志》的创新
广西通志馆 黄汝珍 (77)
- 《襄汾县志·人物》的写作特色
贵州省地方志编委会 陈福桐 (81)
- 浅谈《襄汾县志》的图表应用
贵州省地方志编委会 刘泳唐 (85)
- 为《襄汾县志》概述叫好
贵州省地方志编委会 熊玉瑛 (89)
- 浅议《襄汾县志》以事系人的特色
山西省地方志办 武 承 (92)
- 一展襄汾志 得睹晋风流
四川省宜宾地区方志办 姜仁才 (96)
- 一部具有科学性的新县志
 ——喜读《襄汾县志》
辽宁省鞍山市地方志办 陈国山 (101)
- 志苑奇葩
 ——读《襄汾县志》的体会
山东省潍坊市政府办 杜书乐 (108)

一部学术价值甚高的新县志

——评《襄汾县志》

.....山西省吕梁行署方志办 任勋禄(114)

志书突出时代精神的探索

——《襄汾县志》读后

.....山西省运城行署方志办 员创生(128)

灿灿襄汾志 神州微观新

.....山西日报社 秦洪彦(138)

喜读《襄汾县志》

.....中共襄汾县委 杨耀水(142)

读《襄汾县志》有感

.....襄汾县科委 席韶望(146)

《襄汾县志》编修历程

.....襄汾县志办(151)

丁村人故乡的新丰碑

——代跋

.....张志俊 贾生金(163)

序

曹振武

自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至民国十二年(1923)的357年间,襄汾县的前身——太平与襄陵两县共14次纂修县志。其中明嘉靖、清康熙(2次)的《太平县志》和明成化版的《襄陵县志》已佚,仅存部份序和篇目。相隔68年后的1991年初,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用新的观点、新的材料、新的方法编修的《襄汾县志》问世。这是临汾地区第一部社会主义新方志,也是并县后第一部通合古今、立足当代、统记全境的新县志。时越七载,六易其稿,编纂者以满腔爱国爱乡激情付出很多艰辛与心血。是否全面、系统、准确地反映了当地的历史与现状,能否惠今世利后人,起到资治、教化、存史的作用?各级领导和全县人民都很关注,也引起省内外各界人士的极大兴趣。

京、津、苏、鲁、赣、川、滇、黔、桂、黑、吉、辽、秦晋等十四省、市(区)的数十名同志,在百忙中就《襄汾县志》撰写评论文章或函示灼见,提携后进,不吝赐教,诲人不倦的精神令人感动。收入这本选集的文章作者除著名考古学家贾兰坡先生外,多系方志界的学者专家,有的担负指导全省、市(区)或地区修志工作重任,有的是已出版的区、县志主编,学识渊博,实践经验丰富。他们出于对修志事业的关怀和对编纂者的鼓励,评论中肯定多于批评,若因此而满足,忘记或忽略了《襄汾县志》尚存在着不足和不当,将辜负师友们的殷切

希望。宜把鼓励当鞭策，虚怀若谷，继续向各地学习，逐节检查纰漏，再版时认真纠错补遗。

临汾地区行署地方志办公室，为了总结编修《襄汾县志》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以利今后工作，编印此书，很有必要。这是它不仅是修志人员提高政治和业务素质的好教材，也有助于广大读者对《襄汾县志》及襄汾县情作进一步了解和认识。

嘱我为序，并托代向给予热情支持的老师 and 同志们致意。

曹振武：副编审、山西省民俗学会会长、中国民俗学会理事、山西省地方志学会副会长、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山西分会副主席、山西省家谱研究会副会长、华夏地方志研究所特约研究员。

《襄汾县志》一书很值得一读

中国科学院 贾兰坡

《襄汾县志》一书，由襄汾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纂，1991年1月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这部共664页的图文并茂、装帧精美16开本的巨著定价仅25元。

这部县志包括的范围很广，共有24编111章，对政区建置、自然环境、丁村文化、人口、农业、工业、商业、财政、交通、司法、人事、文化、教育、民俗、宗教信仰、人物等等都作了介绍，的确是一部好书，从内容到装帧都是上乘之作，也摆脱了旧县志框框。

1954年，我在丁村主持过考古发掘，一进村子，使我感到意外的是：村里还有许多明末清初的民宅、祠堂高大的房屋、玲珑剔透的巨大扁额，小巧玲珑的牌楼，都令人惊叹不已。尤其令人感兴味的是，有一处民宅，在小姐住的后楼窗外，修有养鱼池，池的周围还有雕刻的石栏，小姐隔窗即可垂钓。象这样华丽的居民宅院，也并非丁村所独有，我记得在丁村以南的村庄里也可见到。

这些三、四百年前的民居建筑，直至今日还保存良好。我在丁村时，曾向当地老人请教过，“什么人建造了这些房子？”回答说：“多是在北京开钱庄的老板。”在民国一二十年间，山西人在北京开设银号（即钱庄、票号）的人还很多。他们有的铺家在国外设有分号，还可汇兑。北京的钱庄几乎为山西人所垄断。从丁村古老的居民宅院，又联想到北京古老的

钱庄或票号，从而又想到银行的出现。

远在30年代期间，我在北京东安市场中原书店，看过一本英文版的《银行学》。开头第一章讲的就是山西票号，认为票号是银行的“祖先”型。那么，襄汾县境内的这些无与伦比的民居，是否和山西票号有某种关系？我们应当花费大力气，进行“纵横”深入调查和研究，不可使山西人这一伟大贡献从历史上消失。

贾兰坡：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中国文物协会副理事长、国家文物委员会委员、中国地质学会第四纪地质及冰川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太平洋历史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评《襄汾县志》

黑龙江省地方志编委会 梁滨久

七度寒暑，六易其稿，呕心沥血，精心编纂的山西《襄汾县志》（以下简称《襄志》），于1991年1月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了。这是襄汾县的首部社会主义新县志。如李英明、李平朗二位同志在序中所说，它记载了襄汾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淳朴的民情，丰腴的物产，壮丽的山河，先辈的业绩。它的出版，对保存珍贵的乡邦文献史料，对鼓舞襄汾人民在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中奋勇前进，都将起到良好的作用；同时，它也以正确的观点，完善的体例，翔实资料，大胆的创新，朴实的文风，精炼的语言和典雅、古朴的装帧，以及特有的著述风格，进入佳志之林，并为社会主义新县志的编纂贡献新鲜的经验。由于对襄汾的县情缺乏深入的了解，对《襄志》的编纂思想和丰富内涵研究得也很不够，所以，对其做全面、系统的评论，是很困难的。笔者在此仅就读后感受较深的几个方面，谈点心得体会。

一、指导思想明确

《襄志》能够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依据，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剪裁选用资料，记述史实。首先，憎爱鲜明的阶级立场体现得比较好。如对封建时代，着力暴露封建地主阶级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压迫，财政金融编财政收入一节记明赋役繁

苛，百姓逃亡，政府不仅不予减赋，反而在万历年间每亩地加征银9厘。对日本侵略军侵占，《襄志》从各个方面揭露其蹂躏破坏的罪行，如农业编养殖业章记：“日军侵占期间，羊群几乎绝迹”；林业章记：“抗日战争前，树茂林密，日军侵华中，树木砍伐严重”；商业编庙会一节记：“抗日战争前，两县庙会多达40馀处，两县4镇大会，每日不下万人，每天商业成交额多达数万元。日军入侵，神庙佛殿相继毁坏，庙会冷落。”虽只是记事，但对日本侵略切齿憎恨的民族感情溢于言表。对阎政权反人民的一面也给予了指斥。阎政权实行“兵农合一”政策，名为“编组入伍”，实为“强迫抓丁”。《襄志》不但揭露其实质，还记述了群众的讽刺话：“兵农合一好，庄稼地里长满草”；“兵农合一聚宝盆，聚来聚去没有人。”

对建国以来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则满腔热情地歌颂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肯定改革以来取得的巨大社会进步，对党在工作中的失误，则从总结经验教训的角度去记述，而不是以“揭露阴暗面”为立脚点。

其次，《襄志》对所述的事物，全面地、历史地、辩证地看待，不偏执，体现出实事求是的精神。如记述建国以来襄汾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史实，既记述翻天覆地变化和辉煌成就，也不讳言党在工作中的失误，以及失误给各项事业带来的危害。农业编生产管理一节记：“大跃进”中调出大批劳力炼钢铁，搞水利，造成“棉花吊孝，豆子放炮”的误收局面。为创高产，放卫星，要求每亩小麦下种量必须在30公斤以上。如此生产管理措施，使粮棉大幅度减产。在“文化大革命”中，批判自由种植，分散管理，连棉花地梗点播豆类，栽植蕃薯也在批判之列。

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史实，《襄志》也不是一概唱赞

歌，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也指出赌风复活，冥婚仍在盛行，迷信有复起之势。反映出忽视教育这一最大失误造成的不良后果。

对旧社会，《襄志》也不一概贬斥，而是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实事求是的记述。如指出主持14次修志活动的16位知县，均出身于进士、举人和贡士，大都热心地方教育，注重社会风化，兼有一定的政绩。这就使人认识到，旧社会的地方官也不都是贪官污吏。再有，给人印象很深刻的赵盾传。赵盾在历史上一直顶着“弑君”的罪名。《襄志》以马克思主义观点重新审查史料，处理史实，恢复了颇有政绩的“良大夫”的形象。

以上都体现出编者处处实事求是，不从某种政治概念出发的正确态度。

二、总体结构合理

《襄志》的总体结构由概述、各分编、大事记与附录四部分组成；以概述领起，以各分编为主体，以大事记供检索，以附录网罗重要文献。编排科学，结构合理。其中，人事记后移，改变了现行县志将概述与大事记并置卷首的体例格局，表现出总体结构的创新。以英文排目和列图表目录，也很新颖。除此之外，在安排“概述性文字”方面，有独辟蹊径之处：总的概述，高度概括，文字极其简练，仅1900字。各篇前都不加“小概述”和“无题序”之类，章前也很少加“概述性文字”，一些节前也不加此类文字，这样，就把记述事物的份量放在了节和目等实体性的层次上，突出了志书的资料性特点。因为做为资料性著述的地方志，其功用就是提供翔实可靠，有实用价值的资料。而完成这一任务主要靠基本记述单位——节

或目的竖写。“概述性文字”虽有记述下属层次不能记述的宏观、共性内容的任务，但主要是归纳概括下一层次的微观内容，就这方面的作用来说，可以帮助读者加深对微观内容的理解，但并不增加资料的信息含量。而且，编者对内容的归纳概括是否那么准确、精当也是不好说的。另外，层层概述的文字重复问题也令编者伤脑筋，有的重要史料，总概述要提，篇前、章前“无题序”要提，条目的记述中就更更要详述，竟重复四、五次。《襄志》一改“层层设概”的做法，把功夫下在有实体内容的条目的竖写上，给方志界吹来了一股清新的风，可使把“概述性文字”的作用说得玄而又玄的人反思，是否一定要“层层设概”？不过份依赖大小概述来维系志书整体性是否合适？当然，各层概述的设立和编写问题还需要研究，也不能说不设就好。但《襄志》毕竟给我们在“概述热”中提供了另一方面的经验，这在方志学的理论研究中，有着启示的作用。

三、创新之处颇多

《襄志》编者不囿成规，敢树新帜，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有不少创新之处，给社会主义新县志的编纂提供了新的借鉴。笔者试举以下几例：

1、襄汾县在1954年前，原为襄陵与汾城两县。合县前的史实如何记述？《襄志》采取了能合写则合写，需分写就分写的办法，如许多地方记述“两县”如何如何，在建置沿革章、行政区划章、中国共产党章党员节等记述到1954年合县前时，就分记襄陵、汾城两县事。这是因地制宜的办法，是合理的、科学的，为两县或几县合为一县如何处理内容的分合提供了经验。

2、许多县志在建置志里设县城乡镇概况，逐一介绍。

《襄志》不同的是，在行政区划一章中，设了1985年全县各乡镇概况表，列面积、村民委员会数、自然村数、户数、人口数、总耕地面积等6项，这些都是最基本的情况。另设县城章和集镇章，简述城镇的基本情况，这样，既突出了全县中的点——城镇，又照顾了全县中的面——各乡镇，文字也节省，比县城和乡镇逐一加以简介要好。

3、襄汾的“丁村文化”著称于世，丁村文化遗址是全国重点保护文物。1954年丁村遗址的发掘，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由中央和地方相结合，专家和群众相结合的考古发掘，填补了祖国旧石器中期的空白，在新中国考古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襄志》将“丁村文化”列为专编，是突出地方特点的成功做法。按照方志界流行的说法，叫做“升格”，但这一编从地理位置、发掘、保护、一直写到考察参观，内容相当完整，而且更有特色的是，既有文字撰著，又有文献辑录和要目，将撰著与记注两种资料编辑形式结合在一编中，相辅相成，使内容的表达更完美。

4、《襄志》在某些章节后有“附”，记述那些正文不便记述，或归类不妥的内容。值得注意的是，有的“附”用的和正文一样的四号正楷字，有些内容，如附的“日伪合作社”、“伪联币”、“日伪县政权”，“日伪新民会”，“侵华日伪军驻境情况”却用的是五号正楷字。小一号字，表示对日伪时期的政权、军队、社团等，不但入“另册”，而且更加轻蔑，这是一个在版式设计上的创新。

5、《襄志》记述了县政府部门职能和县委机构职能，如财政局，“职责为财政收支安排，国营企业利润收交管理，农业税、契税、特产税征收，国库券推销、社会集团购买力控制”。县委办“负责调查研究，掌握县情、上呈下达，处理县

委日常工作。”笔者还没看到这样写的，这对于人民群众监督党政机关部门的工作，是很有好处的。也可以使工作人员看县志牢记自己的岗位职责，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6、《襄志》在《附录》中记述了革命老人——梅姐的事迹。由于她是生存之人，遵循生不立传成规，不能为其立传，但其事迹特别生动感人，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又不能不记，以事系人三言两语地去记，写不尽意。怎么办？《襄志》采取了在《附录》中详录事迹的形式，既不是为其一生做传，不违生不立传之规，又保存了宝贵的人物事迹资料，是很好的处理办法，比章学诚在人物传里以“特例”来记述生人的办法要高明得多。

7、《襄志》的下限定在1985年，但1991年出版，中间隔5年时间。如何解决较长时间的资料缺载问题，《襄志》以“志余”来记述下限后至1990年6月的重要活动与成就，写了科技兴农、汾阳岭低产区开发、乡镇企业大发展、西贾电灌站建成、襄汾造纸厂扩建、县城建设、集资办学、评定职称等10件大事，为弥补下限时间与出版时间相隔太长的缺憾提供了借鉴。

四、著述水平很高

《襄志》还有一个很突出的编纂特点，就是编者驾驭文字的能力较强，对资料能融汇贯通，提炼、归纳、概括，并用简洁利落的语言，准确地表述出来，表现出很高的著述水平。仅举二例：①军事编战事章写李白成义军进太平：“明崇祯三年（1630），陕北李白成义军东渡黄河，从豁都峪出山进入县境后，在九原山筑工事，挖战壕，转战经年。十六年（1643）冬破太平城，十七年（1644）离去” 仪

1000余字就把李自成义军出入县境的来龙去脉交待得清清楚楚，准确简练，象打电报那样，真是惜墨如金。②文化编美术一节记剪纸：“唐朝中叶，县人就有用纸剪裁飞鸟，花卉贴于墙壁的习惯。千余年盛行不衰，且格调独特，乡土气息浓郁，婚礼的‘双喜’、‘团福’、寿诞的‘百寿’、‘麋鹿’，生子的‘莲生贵子’、殡葬的纸人、纸马，无不作工精湛，惟妙惟肖。新春佳节，户户皆贴窗花，人物、花卉、鸟兽，翻新出奇，妆点节日的气氛。剪纸艺术吸取民间刺绣和戏剧、皮影人物的营养，构图简洁，形态逼真，大胆夸张，流畅传神，流传极广，妇女多能为之，有数代相传者。尤以襄陵、晋城、永固、景毛、大邓、陶寺等乡镇为盛。范村李小铁能剪刻百余种花样，创制出‘计划生育’、‘只生一个好’等新窗花，刻艺精巧，传播甚广。”仅用200多字，就将剪纸技艺的源流、特色、艺术风格、功用、流行范围、创新能人等全面地介绍出来，语言也优美流畅，具有可读性。

当然，志书的著述水平表现在多方面，如结构安排、篇目拟订、体裁运用、观点与史实的有机结合、详略的把握、乃至图文配合等等，但主要是编者特别是主编驾驭语言的能力。从《襄志》是可以看出编者的文字功力的，这样，就使得这部志书不仅是一本提供县情资料的工具书，而且是一个典雅、精美、耐人欣赏的“艺术品”。马克思在谈到《资本论》这部伟大著作时说：“不论我的著作有什么缺点，它们都有一个长处，即它们是一个艺术的整体”（《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第196页）。马克思说的是理论著作，志书是记实之作，也应该是一个“艺术的整体”。